

《歐美研究》第三十八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415-442
http://www.ea.sinica.edu.tw/euramerica/ch_index.php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血緣／血言： 《血之語言》與跨國收養書寫*

馮品佳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E-mail: pcfeng@yahoo.com

摘要

本文經由閱讀韓裔美國作家鄭敬娥的回憶錄《血之語言》處理韓裔美國的收養論述，藉由一個生命書寫的個案研究省思(後)殖民情境下跨國流動中的女性身體。論文首先探討跨國收養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背景，以及在此情境中親緣關係之重新建構，其次討論《血之語言》這本以片斷、揉雜文體的形式呈現被收養人生命經驗的回憶錄，試圖解讀鄭敬娥在跨國收養的脈絡裡如何想像以及再現女性的身體與關係網絡。

關鍵詞：鄭敬娥、《血之語言》、跨國／種族收養、亞美研究、生命書寫

投稿日期：96.11.20；接受刊登日期：97.3.21；最後修訂日期：97.4.29

責任校對：曾嘉琦、朱華瑄、張滌之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NSC-96-2411-H-009-012-MY3 的部分成果，感謝國科會的支持。

壹、前言：「血之語言」vs「愛之語言」？

二〇〇七年六月筆者應邀參加韓國英美文學女性主義研究學會 (Korean Feminist Studies of English Literature) 在首爾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在筆者參與過的國際研討會中，這次的首爾經驗極其難忘，主要因為跨國收養 (transnational adoption) 的爭議，使得其中的一個場次充滿了個人情緒的爆發力。¹ 該場次中《血之語言》(*The Language of Blood: A Memoir*) (Trenka, 2005) 這本回憶錄的作者鄭敬娥 (Jane Jeong Trenka) 以韓國被收養人 (Korean adoptee; 簡稱KAD) 的親身經歷，對於跨國收養的操作大肆批判。其後的問答時間，同場次的西班牙學者與台下另一位西班牙的同事交換眼色，由台下的西班牙學者對於鄭敬娥的論述提出質疑。在此場次開始之前，兩位西班牙女學者方才興高采烈地與大家分享她們各自收養的中國女兒的相片，顯然非常珍惜經由跨國收養所建立的親緣關係 (kinship)。場次結束時，台上的西班牙學者終於按捺不住流下眼淚，哽咽地宣稱她不知道何謂「血之語言」，因為她只知道「愛之語言」(language of love)。短短兩個小時之內，筆者見證了這個跨國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戲劇性的接觸，兩種生命經驗直接的碰撞，強烈的情緒流動撼動了學術場域以及與會學者。這樣的直接撞擊應該不是主辦單位刻意的安排，卻也道出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由於人的流動 (human flow) 之頻繁，(「第一世界」) 收養人與 (「第三世界」) 被收養人在國際性的場域狹路相逢的「意外」終究無可避免，尤其是在「輸出」／「出口」被收養人有五十餘年悠久歷史的南韓。同時，跨國收養這個植基於冷戰歷史的議題，也赤裸裸地呈現在一群女性

¹ 跨國收養有不同之名，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多稱「國家間的收養」(intercountry adoption)，現在有些研究此議題之學者或被收養人強調跨種族 (transracial) 之間收養的議題。

主義學者的面前，不容我們顧左右而言他，或是畫地自限於觀眾的位置，享有保持距離的窺看特權，更不容許我們沉溺於所謂的「憐憫政治」(politics of pity) 之中。²

這個場次中，最令人震撼的是鄭敬娥的憤怒。年輕姣好的臉龐、操著流利英文的回憶錄作者，冷靜的外表卻散發出一波波怒氣，即使身旁的白種女性聲淚俱下，她個人憤怒的氛圍也未曾減弱。面對這個經由「國際」研討會所造就的跨國接觸，至少就筆者個人而言，需要的是批判性介入 (critical intervention)。我們必須思考究竟鄭敬娥的憤怒從何而來？何謂「血之語言」？「血之語言」與「愛之語言」真的互相衝突嗎？應當如何看待跨國收養中所建構出的親緣關係？被動跨越國界的女性身體在此國際化的脈絡中有何特殊意義？鄭敬娥的生命故事或許只是諸多被收養人中的一個案例，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國家、種族、性別、階級層面，無論是在亞裔美國或是方興未艾的跨國收養研究都不容忽視。因此，本文將經由閱讀《血之語言》這本回憶錄，首先探討跨國收養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背景，以及在此情境中親緣關係之重新建構，其次討論《血之語言》這本以片斷、揉雜文體的形式呈現被收養人生命經驗的回憶錄，試圖解讀鄭敬娥在跨國收養的脈絡裡如何想像以及再現女性的身體與關係網絡。雖然本文因篇幅所限僅能處理韓裔美國的收養論述，特別是鄭敬娥的生命故事，但是意義特殊，除了藉由一個生

² 卡特萊特 (Lisa Cartwright) 在討論視覺媒體與新科技之介入如何引發一九九〇年代的全球社會孤兒 (social orphan) 危機時，引用鄂蘭 (Hannah Arendt) 「憐憫政治」的觀點討論西方世界如何觀看其他國家的苦難 (2005: 187-189)。卡特萊特指出，伴隨憐憫政治的實際行動往往是執行遠距救援，但是經由跨國收養的實例可見，缺乏對於被收養兒童之文化與醫療背景的了解而盲目收養，往往會造成救援行動之偏差，最後導致收養一方的反彈，造成一種「失措的政治」(politics of consternation) (2005: 198-207)。

命書寫的個案研究省思（後）殖民情境下跨國流動中的女性身體，同時也誌記了筆者生命中學術研究與個人情感交接的一個重要時刻。

貳、「家自心中來」？：韓裔美國跨國收養歷史

記錄短片《跨種族收養》(*Transracial Adoption*) (Shadid, 2007) 以一段黑白新聞短片開場，畫面是一個羞澀但笑容滿面的亞裔男童在舊金山下船的場景，小男孩旋即被一個年輕的白種男性與中年白種婦人擁抱，旁白告訴觀眾，這個韓國孤兒終於來到「和平的美國」(“peaceful America”)，被他在戰爭中結識的美國大兵及他的母親收養。旁白以「家自心中來」(“Home is right from the heart.”) 結尾。簡短的敘事有如童話故事，暗示著孤兒找到新的家庭／國家，建立起新的親緣關係以及包括父親與祖母三代的速成家庭，因而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³ 但是另一部由韓國廣播電視台 (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 簡稱KBS) 《六十分鐘深度報導》(*In-depth 60 Minutes*) 節目所製作的報導記錄片《外銷嬰兒國》(*Baby Exporting Nation*) (KBS, 2005)，除了提供觀眾韓籍生母急切尋兒的悲泣，還有多起KADs自殺的案例以及被收養人對被韓國「外銷」生財的控訴。⁴ 研討會中憤怒的鄭敬娥以及螢光幕上自殺身亡的年輕人身影，彷彿接續了黑白新聞短片裡男孩的故事，只是結局並不幸福美滿，而是一齣齣變調的悲劇。除了影像敘述，在跨國收養的研究文

³ 片中的三位受訪者一為韓裔少女、一是成年的原住民女性，另一位則是收養黑人兒童的白人養母。三人對於跨種族收養都承認有其困難之處，但是基本上都抱持相當正面的態度，可以說呼應了「家自心中來」的樂觀基調。

⁴ 影片中指出光是二〇〇四年就有三十一名韓裔被收養人在世界各地的自殺案例。《外銷嬰兒國》也是第一部由南韓製作拍攝有關跨國收養問題的影片，意義非凡。

獻方面也往往呈現一種論述上的不安。例如福克曼 (Toby Alice Volkman) 在《跨國收養的文化》(*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論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一九九〇年代以來跨越國界的收養行動越來越熱烈，這種情境雖然創造出「新的親緣地理」(“new geographies of kinship”) (2005: 2)，其中也牽涉到許多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2005: 3)。被收養人成年之後，經常出現許多憤怒的聲音，例如有人建立網站，取收養人英文 adoptees 近似音的 abductees 為網站名稱，質疑跨國收養是類似綁票行爲 (2005: 8)。福克曼以白種女性學者以及收養母親的身分來檢討跨國收養，更凸顯出此類行爲模稜兩可的可能性。如果「家自心中來」的論點成立，跨國被收養的兒童理應在美國這個國／家安居樂業，而不是在心有千千結的壓力之下選擇結束生命。這些年輕人早逝的生命引發的問題是：跨國收養到底是創造新的家庭與「新的親緣地理」，或是破壞家庭關係而製造了更多問題？

這個問題牽連甚廣，並非本文所能全面回答，本文僅能試圖由回顧韓美跨國收養的歷史，建構思考這個問題的脈絡。⁵ 韓美之間的跨國收養在類似議題之研究中頗具代表性，除了美國作為「收養國家」(receiving country) 與韓國作為「送養國家」(sending country) 都可謂歷史悠久，⁶ 而且牽涉的流動人口數字龐大。鄭敬娥在回憶

⁵ 其他的跨國收養行動有英國數百年來遣送多餘人口至殖民地的「祖國兒童」(Home Children) 制度、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將德國猶太裔兒童送往其他國家的「兒童輸送」(the Kindertransport) 等 (Honig, 2005: 214)，以及一次世界大戰有許多來自崩離析之奧匈帝國、德國、俄國的「戰亂兒童」(*Kriegskinder*) 被送到英國、瑞士、荷蘭、北歐國家 (Hübinette, 2006: 142)，本文因篇幅之故無法處理這些議題。

⁶ 那維 (Marianne Novy) 指出美國的樂觀主義使得收養制度得以推行。由於美國立國即是以公民身分而不是血緣為主，因此美國最早出現收養法律，也導致歐洲國家將收養制度化。而美國對於社會改革的熱中以及對於自由與選擇權的信仰也是收養盛行的原因 (2005: 20-21)。

錄中指出，從一九五〇年中期開始，大約有十五萬至二十萬的韓國兒童被送跨國收養 (2005: 257)。《外銷嬰兒國》的報導也提供南韓每年有兩千三百名兒童「出口」的數據。⁷ 這些兒童被「外銷」的歷史脈絡，其實是韓國 (後) 殖民與冷戰的遺續。⁸ 現有的研究文獻中，⁹ 韓裔美國研究者金伊蓮娜 (Eleana Kim, 音譯) 的論文最能言簡意賅而又完整地將KADs產生的歷史社會因素與意義做一整理。金指出南韓最悠久而且持續不斷的跨國收養歷史，始於韓戰之後遺留下的「大兵寶寶」(GI babies)。造成這些混血兒童大量被送至歐美國家的主要原因，是韓戰過後韓國社會赤貧的經濟狀況、缺乏社會服務的選擇，以及傳統儒家思想重視父系血脈相傳的傳統 (2005: 56)。金也認為，研究南韓的收養問題對於了解韓國的現代性非常重要，因為這是韓國後殖民歷史的一部分，更讓我們看穿官方歷史所提供的經濟奇蹟與民主奮鬥等論述之下，其實潛藏了軍事政權的暴力，嚴懲主義式的發展 (draconian development)，厭惡女性的人口發展政策，對於女性的歧視，以及政府過分倚賴跨國收養以解決社會福利問題的政策 (2005: 72)。筆者尤其贊同強調「重新想像親緣關係」(“reimagining kinship”) 與「重新塑造離散族群」(“recasting diaspora”) 的重要 (2005: 73)。特別是在現今全球化的情

⁷ 在跨國收養的「外銷」數字上中國大陸有後來居上的趨勢，如二〇〇六年有八千人左右。目前網路上可見的相關影片大多以到中國收養兒童為主。

⁸ 越戰之後也有相同的越南跨國收養潮，主要收養地是美國以及越南之前的殖民主法國。

⁹ 對於跨國收養的研究以二十一世紀以後較多專書出現，例如福克曼與鄭敬娥的回憶錄以及鄭與歐普拉 (Julia Chinyere Oparah) 等人所共同編輯的文集都是在近年出版。福克曼的選集全部探討跨國收養；而鄭敬娥等人的文集則刻意重新定義並且以跨種族收養為書名，「以彰顯生命中持續不斷的種族化經驗」(Oparah, Shin, & Trenka, 2006: 2)。後者除了提出誰有權力書寫跨種族收養之外，也處理了黑白跨種族收養，以及原住民如何遭到白人政府強制「收養」教化的議題，範圍更加廣泛。

境中，離散族群的研究日益重要，因為跨國收養而造成的人口流動更是不容忽視的環節。¹⁰

跨國收養在人口流動的路線基本上呈現一種殖民的模式。(後)殖民主義的面向因此也是研究跨國收養最重要的一環。例如瑞典籍的 KAD 胡賓納 (Tobias Hübinette) 將跨國收養與韓戰的歷史連結，認為戰後跨國收養的盛行主要是因為美國的築帝 (國) 工程與韓國現代化的交相催化 (2006: 145-146)。胡賓納指出，現今跨國收養涉及每年三萬名兒童的龐大遷徙行動，主要是非白種兒童由後殖民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移動至北美、北歐或西歐、澳洲、紐西蘭等地區，大部分是被白種家庭收養，其中就有三分之一的兒童來自韓國 (2006: 139)。就法律沿革的層次而言，跨國收養也深受西方模式的制約，呈現西化的傾向。根據胡賓納的研究，現在的跨國收養模式可以回溯到一八五一年美國麻州的收養律法。這種模式將以往非西方國家由家族成員收養孤兒的傳統，轉變為家庭之外 (extra-familial) 的收養，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沒有生物血緣的關係，送養與收養的兩個家庭全然隔絕，全部經由法律給予被收養的兒童一個新的身分 (2006: 140)。在收養的法律化與組織化的層次上，美國可以說是開其先河。然而在胡賓納的分析中，這樣的先驅地位卻帶有負面意義。他甚至將跨國收養與跨大西洋的販奴、中國與印度的契約苦力、販賣婦孺作為婚姻或賣淫工具相提並論，認為它們可以並稱為歷史上四大強迫的遷徙行動，但是目前只有跨國收養仍

¹⁰ 伍德堯 (David Eng) 討論跨國收養與酷兒離散的論文中也試圖重新釐清親緣關係，他認為必須由多元文化主義倫理 (the ethics of multiculturalism) 的觀點來面對他所謂的「新的全球家庭」(new global family) 之冒現 (2003: 3)。而改變了二十世紀末以來美國家庭次序的兩大挑戰，則來自於亞裔美國的跨國活動以及酷兒對於家庭常態關係的重新組織 (2003: 5)。跨國收養即屬於亞美跨國活動中的一支；伍也認為跨國收養是二十世紀末最享有特權的移民形式 (2003: 7)。

屬合法 (2006: 143)。胡賓納歷史化的論述與比較式的論點極為強烈，冷靜地經由學術性的語言，表達出被收養人對於因為年幼無法自衛而遭強迫改變親緣以及國家認同之憤怒。他的觀點直接挑戰在跨國收養論述中因「愛之語言」而遭到模糊的焦點，亦即無助無依的兒童如何橫遭「強迫遷徙」，也一語道破這種殖民主義的行徑是如何經由跨國／種族之愛的包裝而被法律以及社會所允許，甚至鼓勵。

在諸多「愛之語言」的論述中，基督教對於跨國收養的歷史與運作有極大的影響。畢竟基督教的傳教史與殖民主義本來就緊密相連，而在近代傳福音的過程中，有時甚至收養的嬰兒也成了傳播宗教的工具。本身是亞美混血的KAD金河西 (Jose Ran Kim, 音譯) 就認為韓國之所以位居送養國之冠，除了韓國的父權傳統以及亞洲人對於亞美混血兒童的種族歧視之外，受到基督教的影響也極大，特別是教義中女性地位卑下的論點 (2006: 152)。研究韓國跨國收養歷史的文獻中大都提及何特 (Harry Holt) 其人。金河西指出，這位來自奧瑞岡州的基督徒最早提倡收養韓戰孤兒，甚至成立自己的收養機構 (Holt Adoption Agency)，專門幫助美國父母收養韓國兒童。何特遭到的最大批評就是刻意規避法令，只以申請者的信仰為條件，完全忽略評估他們是否適合作為收養人，使得兒童福利陷入危機 (2006: 154)。在金河西的分析裡，何特基本教義式的操作也有其金錢上的目的。他的收養事業與新教教義中的工作致富的觀念可以互相呼應 (2006: 156)。在種族的層次而言，跨國收養中刻意強調的「色盲」(colorblindness) 其實跟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同樣危險，因為這樣的盲目造成大家忽略了跨國收養的案例大多是白人養父母收養有色人種兒童，更何況當新教哲學碰到有色人種時，經常是以從「黑暗或野蠻的」本土文化中「拯救異教徒」的任務為主

(2006: 158)。金河西的評論或許顯得過分針對特定宗教，甚至有仇視基督教之嫌。但是他的言論並不特立獨行，他也並非唯一批評基督教在跨國收養中以愛為名行傳教之實的人。¹¹ 反之，他的觀點敦促我們對於以愛為名的宗教活動加以省思，並且更審慎看待基本教義式的宗教操作。這也或許可以回應首爾研討會中西班牙學者「愛之語言」的宣言，即使是最好的意圖也可能造成恆久的傷害，特別是在跨國／種族收養這種權力配置不均衡的行為之中，由於被收養的一方往往是無法替自己發言的幼兒，甚至連強加己身之愛都無權拒絕，只能被動承受暴力改變的後果。在諸多不定性的因素影響之下，顯然「愛之語言」不足以抗拒社會環境的負面影響。

除了外來的殖民帝國與宗教勢力的影響，造成韓國跨國收養「企業」的內在原因是韓國的父權社會與社會福利政策之不足。事實上，誠如尼爾森 (Kim Park Nelson) 所言，跨國收養的操作涉及「複雜的經濟關係」(2006: 89)，送養的生身國家 (birth nation) 往往收受極大的經濟利益，例如南韓每年可因此收益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美元，雖然大多是餵飽中介人的私囊，對整體國家經濟沒有太大助益 (2006: 96)，但是南韓卻可以因此減少許多社會福利的支出。在政治極端化的時期，跨國收養甚至被視為因應全面工業化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人口過剩問題的方式之一 (Hübinette, 2006: 146)。¹² 這些內部因素都使得KADs成為傳統與政策的犧牲品，也

¹¹ 例如胡賓納的論文一開始就指出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的跨國收養活動深受基督教影響，他的分析中也一直提及基督教與殖民主義難分難解的糾葛。鄭敬娥在與養父母關係破裂之後陷入極度憂鬱，因而產生追查自己收養資料的念頭。她在回憶錄中以長篇幅、黑色幽默的反諷口吻描述這段鬼打牆似的經驗 (2005: 193-200)，也部分映證了金河西對於基督教機構的收養程序的批評。

¹² 胡賓納指出為避免人口過剩，韓國政府積極鼓勵家庭計畫以及移民，而跨國收養恰好為兩者之結合。朴正熙與全斗煥的集權式統治時期也正是跨國收養的全盛時期。

造成KADs強烈的反動。而KADs對於送養母國的反動情緒，或許可以從他們「回歸」時與現代化之後的韓國政府的實際接觸看出。

自從一九八八年漢城夏季奧運成功營造現代化的韓國形象，再加上近來逐漸走出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韓國社會輿論對於跨國收養的議題興起一片反省之聲，因此才有《外銷嬰兒國》這樣的報導出現。南韓政府也做出某種回應，主要表達的方式是試圖賦予這些KADs某種名譽上韓國人的身分。金伊蓮娜的研究指出，基於金泳三與以及金大中兩位大總統推動經濟文化上的「世界化政策」(*segye-hwa*)，¹³ 南韓政府認可這些被收養人在法律上屬於韓國「全球家庭」的成員，並且成立海外韓人基金會 (Overseas Korean Foundation)，以夏令營形式舉辦「母國之旅」(*motherland tours*) 提供給這些KADs (2005: 51)；這些營隊以介紹國家所規範的傳統韓國文化為主，著重在所謂的「文化訓練」(*cultural training*) (2005: 54)。這樣的活動只重文化規訓而不重視親緣關係的重建，並未幫助KADs尋找親人，因此引發許多參加學員的不滿。金伊蓮娜以身為某次營隊輔導員的實際經驗做一見證，進而分析這樣的不滿部分是因為對於霸權式的韓國身分產生的「不認同感」(*disidentification*)，引發了跨國場域中出現一種被收養人集體意識 (*collective adoptee consciousness*)，抗拒南韓政府將「文化」與「公民身分」(*citizenship*) 亂點鴛鴦譜 (2005: 52)，甚至發展出金所謂的KAD「第四文化」(*“fourth culture”*) (2005: 59)。另有研究者指出，KADs對於以跨國收養論述為研究方向的學者也不甚認同，因此出現以「剝削KAD」(*Kadpropriation*) 看待「收養專家」研究的新辭彙 (Jo, 2006: 286)，甚至以成立具特殊族裔認同的KAD國 (*KAD Nation*) 為目標 (Jo,

¹³ 金大中還曾公開向KADs道歉。但是《外銷嬰兒國》的報導在二〇〇五年的出現證明韓國政府並未能有效管制或改變跨國收養的體制。

2006: 289)。這些近乎民族主義式的訴求反應出KADs對於歸屬感的強烈需求，但他們需要的不是政治人物道歉，或是制式規範的回歸之旅，甚至養父母的愛之語言。在好戰、抗爭的表面之下，某種程度而言他們的訴求其實相當悲情，希望能夠找到可以因為生命經驗相同而能彼此依靠、相互取暖的同伴。

事實上韓國政府所提供的文化之旅反而可能造成極大的反效果，不但政府所提供的祖國文化知識與KADs現實的生命毫無連結，而且被收養人更硬生生地被迫面對成長以及血緣文化之間巨大的鴻溝 (Yngvesson, 2005: 36)，這也是楊維森 (Barbara Yngvesson) 所企欲解構的「回歸神話」(“the myth of the return”) (2005: 26)。¹⁴ 楊維森指出跨國收養基本上包括兩個相互矛盾的故事型態，一是「拋棄的故事」，另一則是「根源的故事」。前者認為被收養人在法律上與有血緣關係的親族已經完全決裂，因此可以「自由自在」(freestanding)，後者則認為被收養人應該「有根有源」(rooted)，要透過種種回歸行動認知其種族、宗教與文化背景 (2005: 26)。然而被收養人往往既不能「自由自在」，即使回歸血緣文化之後也無法保證全然「有根有源」，反而失去方位 (Yngvesson, 2005: 27)。這種失去方位而無所適從的情形可見於許多被收養人的自述之中，例如金河西以「恨」(han/한) 字形容「韓國經驗的本質」，「恨」也深植於跨文化被收養兒童的經驗，是一種集體性的恨意 (2006: 152)。另一位從九歲開始接受心理治療的KAD則回歸漢醫系統，以「火病」(hwa-byung/화병) 代表因恨所產生的身心疾病。「火病」起源於人際關係的衝突與壓抑的憤怒，或是內化外在衝突之後轉而對於自我的憤怒，藉此發洩無所不在的失落感 (Lo, 2006: 169)，也

¹⁴ 楊維森曾伴隨瑞典養父母以及來自智利的養子女進行「回歸」智利之旅，她以作為翻譯者的經驗以及實地訪談結果試圖打破回歸神話的迷思。

就是「鬱火」(wool hwa/울병) 積壓心頭而導致生病 (2006: 170)。恨與火病的兩個字很貼切地形容被收養人精神壓力與壓抑，也可用以解釋《外銷嬰兒國》報導被收養族群高自殺率的現象，更可說明「家自心中來」或是愛之語言等論述不足之處。

收養國社會中的種族歧視也是造成跨種族被收養人忿忿不平的因素之一。誠如羅柏茲 (Dorothy Roberts) 對於美國收養現況與種族關係所做的研究指出，即使再親密的跨種族關係仍然無法否定或解決美國境內無所不在而且系統化的種族主義 (2006: 50)。但是種族主義絕對不會自動消失，由以上社會學的研究與被收養人的自述歸納可知，如果深植於社會結構中的種族歧視無法改變，創造新的親緣地理的想法只能存在理論的層次，難以在現實世界實踐，更無法改變送養國與收養國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或是有效保障被收養人的人權，而跨國／種族被收養人的「恨」及「火病」更難以止息。因此會有更多自殺的案例或是鄭敬娥這樣不平而鳴的憤怒之聲出現。相對於斷然結束生命以求解脫，化恨與火病為文字呈現顯然更具建設性。這也是近來跨國／種族被收養人生命書寫逐漸冒現的主因。¹⁵ 他們試圖透過自己的經驗為以往沉默的族群發聲，彰顯

¹⁵ 根據明尼蘇達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尼爾森與筆者在二〇〇七年美國研究學會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年會私下訪談時指出，跨國收養的議題為何在此時刻浮現並且廣受矚目的因素可以就跨國收養的歷史做一觀察。一九五〇年代跨國收養伊始，強調的是同化的意識形態 (assimilative ideology)，因為第一代的KADs大多是混血兒，極不見容於韓國社會，因此被收養之後會急切想要適應以及融入新的社會環境，而且當時社會情況較為保守，不太討論跨國收養議題，因此也很難建構跨國收養的論述。在一九六〇年代民權運動興起，種族意識提升，跨種族收養成為一種打破種族藩籬的姿態，但是對於跨種族與跨國收養所涉及的種族問題卻刻意不予以討論。一九七〇以及一九八〇年代基於對養父母的尊重，被收養人會被視為白種人，造成一種善意的「色盲」，但是被收養人成年之後必須單獨面對種族意識形態。如鄭敬娥這一代的KADs就面對這樣的困境，因而急切為自我發聲，其論述、書寫也往往充滿憤怒。本身也是KAD的尼爾森在其博士論文

跨國／種族收養制度所造成的創傷，既是一種自我療癒，也是以文字「報仇」的方式。¹⁶ 以下將以《血之語言》為例更深入探索被收養人的生命經驗，特別是討論鄭敬娥如何以女性身體以及關係網絡的想像與書寫再現跨國／種族收養所留下之不可磨滅的印記。

參、「血是沒有語言的記憶」：《血之語言》的女性身體及關係網絡

《血之語言》的扉頁引用歐慈 (Joyce Carol Oats) 的兩行詩句：「因為我們血緣相連／而血是沒有語言的記憶」。這是回憶錄書名的出處，也是鄭敬娥對自我書寫行動的期許：當自然相連的血緣因為外力而斷裂時，她要創造出可以記錄、記憶的「血言」以修復這樣的創傷。因此，相對於「恨」及「火病」這些回歸韓國詞彙與醫學傳統的說法，鄭敬娥直接以血之語言探討血緣關係是如何因跨國收養而分裂、甚至扭曲。鄭敬娥在回憶錄中提到，她跟其他不同國家的被收養人接觸時，最深的感觸就是「記憶的破碎，因為兒童的觀點以及語言的混亂而扭曲」，而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被收養

中收集了大量KADs口述歷史，試圖以民族誌的方式討論跨國收養的議題。根據尼爾森所收集的資料，她認為造成這些憤怒有雙重原因：其一是跨國收養對於被收養人以及生身父母而言都造成一種生命的中斷 (disruption) 以及無可挽回的損失；其二是養父母拒絕承認有這樣的中斷以及損失，造成被收養人心靈的二度創傷。尼爾森也談到被收養人第一次在鏡中看到自己不同於養父母外貌的「鏡像驚嚇」(“mirror shock”)，以及此類驚嚇所造成的持續性傷害。雖然在血緣家庭中也經常產生各種家庭問題，但是因為跨國收養所造成的生命斷層以及外在強加之否認／否定卻相當獨特，也會引發不同之問題。

¹⁶ 以文字報仇的說法深受湯亭亭的《女鬥士》(The Woman Warrior) 的影響，鄭敬娥在《血之語言》中特別引用《女鬥士》以文「報仇」的段落 (2005: 218)，這段引文出現於鄭敬娥與安排她被收養的機構路得教會社會服務社 (Luther Social Service) 的總裁談話之後，報導與報復這個收養機構的企圖十分明顯。

人共同的記憶就是「漂浮在時間裡夢境般的碎片，有一些內容，但卻很奇異的沒有文字」(2005: 149)。面對這些「沒有文字」的記憶碎片，鄭敬娥賦予自己重建記憶的任務，也條列出清楚的任務內容——「這是我分派給自己的工作，要用脈絡性的線索重新建構一個家庭的文本，我的意圖如下：相信神秘不可知者；將已知與未知者並列；蒐集被忽略的、殘存之物——石頭、破鏡子、被遺棄的東西。我將以此縫製一條新的記憶與想像之被，每一針都是些微的轉化，每一線都是我的哀悼之作」(2005:150)。¹⁷ 此一拼湊棉被的意象說明了她美國的傳承，訴諸廣被民間的民俗工藝傳統。但是她「縫被」的素材則跨越了時空國界，代表因為跨國收養所造成的血緣斷裂與認同混淆，經由她以片斷與揉雜的形式，將各種異質性的碎片拼湊成能夠傳達血之語言的生命書寫，創造出一條完整而能溫暖生命的棉被。

《血之語言》令讀者印象最深刻之處也就是文本中生命書寫形式的翻新。這本回憶錄的九個章節雖然大致上根據鄭敬娥的成長歷程發展，但是她特別將生母的書信作為第一章，讓母親經過翻譯的聲音作為生命源頭，以母親充滿悔恨歉意之口道出敬娥出生的故事，回應了血緣關係上不可磨滅的事實。而文本結尾則是鄭敬娥給母親的短箋，為書寫這本回憶錄而家醜外揚向生母道歉，強調她只是想以自己所知道的「美國方式」來榮耀母親，並且將書中的故事獻給母親，最後以韓國文字結尾 (2005: 263)。女兒的書信回應生母的召喚，不但在形式上顯得首尾呼應，也產生某種象徵式的親緣連結，修補了曾經斷裂的母女關係，結尾以韓文做出類似署名的動作更註記了其韓國認同。包夾在母女兩封書信之間的是敬娥成長的

¹⁷ 《血之語言》第二章一開始時，鄭敬娥在存放《高麗大藏經》的海印寺 (Haainsa) 撿了一顆白色小石頭放在背包裡帶走 (2005: 14)，象徵式地開始蒐集記憶的任務。

故事，但是在陳述「事實」的散文敘事中，也夾雜混合了童話、傳說、劇本、詩歌、食譜、甚至填字謎遊戲，¹⁸ 顯現強烈的實驗企圖以及創新回憶錄書寫的決心。此外，鄭敬娥也將她自己的回憶錄轉變成集體性的記憶，不但涵括生父母與養父母的家族歷史，也插入韓國殖民歷史的回顧，以及她所成長的明尼蘇達小鎮哈落 (Harlow)。就象徵意義的層次而言，這種集體性書寫可謂鄭敬娥建構家／國關係網絡的一種方式，作為彌補被收養人被拋棄的創傷。文本中女性關係的網絡尤其重要，除了透過與生母、養母、姊妹的互動釐清因跨國收養而扭曲的身分認同，鄭敬娥更以特殊的想像與詞彙形容她自己跨越疆界的身體，成為她的自傳書寫中最為重要的面向，也是解讀她所創造的「血之語言」極其重要的關鍵。

《血之語言》雖然也提及與父親以及男友的互動，但女性之間的關係則是文本的主題，將鄭敬娥的個人故事串聯成家族故事。回憶錄的第一章只有生母康恩仙 (Kang Ahn-Sun, 音譯) 的一封長信，以經過翻譯的蹩腳英文娓娓道出將兩個女兒送養的原因。因此鄭敬娥的回憶錄是以母親回顧不堪回首的往事開場，經由母親的書寫為血緣關係之重要定調。她滿懷歉意的文字暴露了韓國戰後的赤貧窘境，也赤裸裸地呈現韓國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信中提及她不但要撫養丈夫前妻遺下的兩個女兒，更要為連續生下三個女兒而備受責備，在她企圖逃家之後生下的敬娥，甚至不被父親承認是親生女兒而差點被棉被悶死。其後，經過敬娥的轉述可知出身士族的生母是個戰爭的受害者，她在第一任丈夫死於戰爭之後被迫改

¹⁸ 這個字謎名為「放逐者的填字謎遊戲」(Exile's Crossroad)，以鄭敬娥的韓文名字 KYONGAH 置中，字謎中的「朔望」(SYZYGY)、「模稜兩可」(AMBIVALENT)、「弔詭」(PARADOX)、「懸置」(SUSPENSION)、「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怪胎」(FREAKS) 等字眼 (Trenka, 2005: 225)。

嫁，同時她也是個家暴的受害者，被酗酒的第二任丈夫拳腳相向，甚至鼻子也被咬掉而毀容。但是從《血之語言》中浮現的恩仙卻是一個拒絕向命運低頭的女性，在逃出丈夫暴力的陰影之後以清潔辦公室維生，並且以堅強的毅力找到兩個送養女兒的下落。在鄭敬娥的筆下，恩仙更是一個說故事的母親。敬娥在參加母國之旅時第一次與生母團圓，這段母女相逢的時間則有如天方夜譚，成為女兒聆聽母親敘說生命故事的難忘經驗：

那些夜晚，我開始了解母親艱苦的生活。在那兩週裡，我從不同的翻譯者聽到相同的故事，姆媽 (Umma) 想要溝通的意志將每個人都變成她的代言人。因為我不懂韓文，她比手劃腳地演出她的故事。……她是獨角劇場，五呎身高及一百磅重，充滿熱火與辣椒醬。

她向那些多年以來聽不勝聽的朋友、向陌生人、向我說那些故事。我想她是希望說故事的行動可以贖罪，經過訴說，大家可以知道她想要變成什麼樣的人，而不是她現在所變成的樣子。我懷疑她是不是希望有一天她說故事時結局會魔術般地變好，她可以經由說故事掌控她的生命。(2005: 115-116)

恩仙還說到去機場送女兒前往美國時，悲傷到忘記穿鞋，或是在女兒被收養之後揸了一隻狗來記憶／紀念失去的孩子，最後連狗也被偷走等等透著荒謬卻又極為悲情的細節。在鄭敬娥鮮活地描寫之下，這個說故事的女人悲劇性的生命躍然紙上。恩仙有如《老水手之歌》(*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中受詛咒的水手，身不由己地見人就訴說自己的罪行，不斷藉由重述故事贖罪。但是她不像浪漫詩作的主角尚有得到救贖的希望。語言或許能夠袪除消解罪惡感，讓她感受掌控自己生命的錯覺，但是也使得她必須不斷重複經歷失去女兒的痛苦。透過描寫說故事的生母對於語言行動所抱持的期待，鄭敬娥充分展現她對於語言的認知。畢竟，敬娥也是個說故事

的人，從幼稚園時期拿著媽媽寄來的照片與韓服 (hanbok) 在學校四處巡迴「展示說明」(“show and tell”)，到試圖透過書寫行動重整自己變調的生命，敬娥一方面對語言的力量充滿期盼，一方面又深深了解語言的侷限。說故事讓隔絕二十多年的母女重新做了某種連結，但是再多的故事也無法喚回分離的歲月或是因此而改變的生命。

跨國收養也使得鄭敬娥的姊妹關係極為複雜。大姊美佳 (Mi-Ja, 音譯) 四歲半時伴隨六個月大的妹妹被送到美國變成了卡洛 (Carol)，初至美國時只會重複一個韓國字「痛」(“*apa, hurt*”) (2005: 29)。卡洛與敬娥所變成的珍 (Jane) 之間因為養父母的偏心而漸行漸遠，卡洛甚至告訴稚齡的敬娥是因為她太醜所以她們才被送養，可見姊妹之間的互動不良：「卡洛只聽到『我們比較愛珍』。這個被她媽媽犧牲來救小妹妹的女孩越來越憎厭我……。而我們彼此之間從不提到韓國。我們在嘴上編織了像愛一般厚實而不通透的塞口布」(2005: 30)。同時被送到美國的姊妹無法提到韓國，這樣的禁忌說明失去血緣國／家所造成的巨大傷痛。一直到會說完整英文句子才開口的卡洛長大之後追求全然的同化，在認同上選擇跟敬娥截然不同的方向：「卡洛的同化完美及完整到不記得她自己的韓國名字，對韓國毫無興趣，對我對於韓國的興趣也不感興趣，結了婚，買了休旅車，生了孩子」(2005: 141)。但是同化是否能解除那用母語所反覆訴說的「痛」？回憶錄中沒有多言，然而沉默或許是另一種表達哀痛的方式——被母親犧牲的痛，失去「美佳」的痛。

雖然遭到卡洛的刻意疏遠，但是重返韓國的敬娥卻在姊姊安美 (Eun-Mi, 音譯)、小妹明禧 (Myoung-Hee, 音譯) 身上看到不可磨滅的家族特徵：「安美說她們一見到我就認出我來。純然是因為走路的姿勢。每一個姊妹或多或少都有那特殊的走路姿勢，鞋跟越高

就越明顯」(2005: 128)。敬娥被養母一再批評的走路姿勢卻是姊妹之間的辨識方式，也是血脈相連的證據。相似的走路姿勢與外貌「驚人地相似」(2005: 128)，都訴說著遠隔重洋也無法改變的血緣關係，這樣的生物性記憶是鄭敬娥的血之語言重要的關鍵，也是她拾回親情的重要依據。同時，在安美身上也可見現代韓國女性的堅忍。安美除了工作，也要肩負照顧夫家與娘家家人的責任，但是她仍然可以開懷大笑，即使是飽受父親的虐待、貧窮、親友的冷漠都無法奪走她「美麗與勇氣的本質」(2005: 182)。敬娥對於姊姊的讚美也是對於新一代韓國女性的禮讚。

相對於生母炙熱的情感表達以及姊妹之間血濃於水的親情，鄭敬娥對於養母馬格莉特的描寫著重在她的自我壓抑，除了以馬格莉特從不公開炫耀的頂級麵包食譜展現養母宗教性的謙遜，也以在馬格莉特的監督之下全家靜默哀悼祖母去世的記憶側寫養母面對傷痛的自制。馬格莉特的潔癖不只用來整潔環境，也用於清除情感。敬娥說過，「我媽完美消毒過的家幾乎成功地將我的感情淨除」(2005: 58)，使得她只敢也只能透過音樂表達情緒。伍德堯稱這種情感的消毒是「對於被收養人情感嚴格的管理」(the strict management of adoptee's affect) (2003: 16)。在她對養母的家族的追溯中，可以發現這樣的壓抑性格竟然也是世代相傳。外公一直以前妻之名羅倫 (Lorraine) 稱呼外婆露林 (Lourine)，對於這樣荒謬的錯誤「兒女輩都知道原因而漠視這件事。孫輩則直到她去世才知道她的真正名字」(2005: 28)。外婆面對失去真名都不以為意的表現可謂自我壓抑的極致表現，也難怪馬格莉特強調自我克制。有研究者指出養父母經常感到某種「陰影存在」(shadow presence) 的壓力 (Kendall, 2005: 163)，這種陰影當然是來自不知身在何方，卻與養子女血脈相連的生身父母。因此馬格莉特對於敬娥的生母絲毫「不

感興趣」，一方面是因為母親的規訓與早期收養政策鼓勵全然忽視生身家庭，¹⁹ 另一方面也是某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機制，試圖忘記「生母」這個存在於她與珍／敬娥之間的陰影。鄭敬娥尋找生母，甚至為癌症死去的生母舉行追悼會的行為對於馬格莉特而言可謂雙重背叛。鄭敬娥用第二人稱的方式描寫與養父母因追悼會而決裂之事：「他們不了解你為何需要對姆媽之死表達情感，因為他們雙親去世時他們從未表達過情感。他們覺得遭到背叛。他們聯手對付你，因為他們覺得你跟別人聯手對付他們，跟那些韓國人站在一邊。你不再是他們的女兒。他們不要你了」（2005: 201-202）。馬格莉特不但無法了解鄭敬娥追悼生母的必要性，甚至感到憤怒，因為這樣的哀慟與追思將她力圖驅除的「陰影」從遙遠的韓國帶到了美國的家門口。因此當鄭敬娥因極度沮喪而對養母出言不遜時，養父母立刻切斷與她的關係，不但沒有參加追思禮拜，也拒絕參加她的婚禮。這些抽離親情的行動，等於同時切斷後天建構的親緣關係，也不認可她建構任何其他親族關係的可能，造成敬娥二度成為孤兒的雙重失落。

事實上作為養女的鄭敬娥也一直被許多「陰影」籠罩，最主要的原因是被拋棄的恐懼。年幼的敬娥並不了解自己的不安，甚至想像自己是店裡許多娃娃之一，只是幸運地雀屏中選。這樣商品交易式的想像讓她害怕——「我也可以被退回店裡……。不，我不要被退回去。我要留在這裡，因為我愛我的家人，而且如果兩個媽媽都把我送走，當然就永遠沒有人會再要我了」（2005: 24-25）。被送養的被棄經驗讓她物化了自己，而且是隨時可能被再次退貨的瑕疵商

¹⁹ 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的收養強調忽略血緣關係，試圖「抵除生身父母」的存在，現今則鼓勵「開放性的收養政策」(open adoption policy)，試圖探索與血緣家庭的關係 (Volkman, 2005: 14)。

品。鄭敬娥對於自己收養身分的另一個想像，是她的替代性與雙重性。她與姊姊「會被那從未受孕的親生兒子所糾纏，這個膚色粉紅的男孩有著像母親一樣美麗的藍眼、像父親一樣滑稽的微笑。我們會被這個陰影，以及我們自己死去的雙胞胎所糾纏，我們換換衣服就取代了她們：活到六個月的敬娥以及當她四歲成爲卡洛時死亡的美佳」(2005: 29)。成年之後，敬娥終於有了詞彙形容自己與這個陰影般的白種男孩之間的關係，知道自己是個「替代的孩子」(replacement children)——「替代親生兒女而進門的孩子」(2005: 207)。經由第一代混血 KAD 瑪莉 (Marie) 的分析，使得鄭敬娥也意識到養父母對她的恨意——「對於我們的父母而言，我們提醒了他們是不孕的。我們提醒了某人的身體出了差錯，女性能力或是男性能力不對勁。我們是不足、不圓滿的提醒者」(2005: 207)。養父母布爾 (Brauer) 夫婦因爲宗教責任以及來自於同儕與社區的壓力，透過路得教會收養了兩個韓國女孩，但是他們的家庭從不完整。馬格莉特對於敬娥哀悼生母之死的行爲不能認同，某種程度也是因爲與敬娥共同哀悼就是承認她無法擁有親生子女的「缺陷」，讓她自己都無法意識到的恨意因這個缺口而浮現。

從 KAD 的恨到養父母可能存在的恨，讓人不禁懷疑跨國收養所使用的可能不是「愛之語言」而是「恨之語言」。甚至敬娥的回憶錄中都以「恨」(*han*) 來表達她與養父母之間無法溝通的文化隔閡。養父母提供的是衣食無缺的物質生活，但從未離鄉背井的他們無法了解失根的感受，當然更不知道「恨」這個字或這種情緒——「但它仍然從地球的另一端爬了上來，穿過她的腳底，像是建築物支柱的雙腿與身體，結晶成爲堵在喉間的哀傷，讓新的可遺忘的生命成爲止血帶」(2005: 238)。此處詩性的語言引導出一個受創、僵化的身體意象，這也是《血之語言》中除了商品娃娃之外的諸多自

我身體想像之一。這個意象緊接前一個更暴力的身體意象：敬娥想起以前養父母家族農場的年度殺雞活動，全家動員，好讓每個家人都能分到宰殺洗淨的雞隻過冬。敬娥記憶中存著被爺爺一斧頭砍掉頭的雞還四處奔逃的詭異場景，令她想起施洗者約翰 (John the Baptist)。美國中西部農莊過冬的季節性活動與基督教的聯想卻帶出敬娥驚人的想像與願望：

我要我的頭被切掉，這個隱喻太強烈了，直到後來我才了解那根本不是求死的願望。我夢著、幻想著、想像著斷頭台的慈悲。對立的二元性將我的身體跟我的頭腦分開，荒謬到我幾乎從肩膀分飛成兩截。

我所渴望的是完整性，是我的身體像我的頭腦那樣雪白以及屬於北明尼蘇達州。我希望能正常，不需要在情感上斷傷自己來找到定位。(2005: 237)

這是敬娥以「肢體語言」(body language) 具體地道出跨國／種族收養所造成的身心分裂，白種人的思想與亞洲人的身體成了她不可承受之重，甚至想到切除承載著因教化而養成白人思想的頭顱。

甚至在填寫大學申請表格的時候，敬娥都全部勾選「白種」選項。使得她做這個選擇的真正原因是：「我不想做韓國人。韓國是在家裡不能談起的地方；是讓學校裡其他的孩子對我投以惡意的目光」(2005: 129)。但是每個學期她的表格都會被學校的註冊單位修正為「亞太群島人種」(Asian-Pacific Islander)。想要「含混過關」(passing) 的心願終究敵不過明顯的種族差異性與外在的種族分類。成長於哈洛這個「世界的火雞之都」(2005: 18)，以德裔或北歐後裔為主的中西部小城，敬娥的亞裔身體是個移植外加的異物，不斷遭受排斥。她的經驗代表KAD的「種族性精神分裂」(racial schizophrenia)，由於一個種族主義作祟的社會造成對於自己身體的

厭斥與無法滿足的期待。這樣的「種族性精神分裂」或許也是被收養族群高自殺率的主因。同時，她也陷入伍德堯所謂的亞裔美國「種族性憂鬱症」(racial melancholia)，在因為跨國收養喪失「亞洲性」(Asianness) 之後，又被主流美國一再視為外國人，永遠無法達到理想化的「白種性」(whiteness)，在高壓的情感管理之下，無法投注於新的人事物與理想之上，陷入一種持續不斷的情感懸置狀態 (2003: 16-17)。²⁰ 敬娥也因此在她的回憶錄中不時插入戲劇性的種族歧視場景——例如以《不用煩惱，包君舒暢》(“Don’t Worry I Will Make You Feel Comfortable”) 為名的個人喜劇表演，以口音濃厚的韓裔女孩做主角，諷刺社會中盛行的亞裔刻板印象 (2005: 96-98)，或是以童話表達「他者」被排斥的悲傷——就像是《快樂村》(*The Happy Village*) 裡不被接受而遭溺斃的龍 (2005: 53-55)。回憶錄以戲劇化或神話等等敘事手法呈現美國種族主義，透過這些夾雜於現實生活的快閃片段，讀者得以感受亞裔美國生命經驗中極為晦暗的一面。

敬娥對於自己身體的厭斥或許也與她被跟蹤騷擾，甚至幾乎被強暴謀殺的經驗有關。敬娥做大學新鮮人的時候被一名騷擾客盯上，多次闖入她家，最後因為企圖強暴與謀殺敬娥被捕。這樣聳動的經驗也與敬娥的種族背景有關，這名騷擾客甚至當面辱罵過她：「你不過是個在白種男人社會裡的韓國人。你是東方佬 (gook)，你是清仔 (chink)」(2005: 83)。在遭到騷擾的期間，敬娥經常做的夢是全身赤裸地被對方追逐，或是化作一隻安靜的兔子蹲在他的腳

²⁰ 伍德堯也強調這種「種族性憂鬱症」是亞裔美國社群的常態，而非佛洛伊德式的病態，是一種去病理化的情感結構，一種持續協調的過程 (2003: 20)。但是因為收養家庭拒絕承認這樣的情感損失，使得原本應該是跨世代與跨主體性的協調過程變成主體內在的 (intrasubjective) 孤立與沉默 (2003: 21)。

邊，等待獵人走開，獵人卻遲遲不動 (2005: 81)。這些夢中的身體想像顯示她的無助與恐懼。騷擾客被逮捕之後，瀕臨暴力威脅的經驗仍然使得她幾乎精神崩潰，對於自我的厭惡讓她甚至想要自殺：「我恨我自己——因為我讓家庭蒙羞，因為我毫無價值，因為沒有人重視我」(2005: 89)。只有經過無數的心理治療與諮商之後，敬娥了解自己處於「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Post-Traumatic Distress Disorder)，才由自暴自棄轉為自助自救，從熟讀法律到學會用槍；雖然敬娥至今仍然惡夢不斷，但是至少她試圖走出暴力的創傷陰影。這個慘痛的經驗卻意外地逼迫敬娥成長，也使得《血之語言》沉重的情節稍有一絲轉變的希望。

敬娥對於自己身體想像最重要、也最具轉化力量的是兩種蝴蝶的意象，一是隨季節移居的帝王蝶 (monarch butterfly)，一是有如彩蝶的韓服。敬娥在小學的自然科學實驗裡認識每年在明尼蘇達與墨西哥之間穿梭遷移的帝王蝶。文本中插入一頁〈如何養殖帝王蝶〉(“How to Raise a Monarch Butterfly”) 的短文，有如小學生科學實驗的報告，除了飼養蝴蝶的八個步驟，也強調實驗的重點「遷移」(migration)：「帝王蝶會遷移。這與移居 (emigrate) 的物種不同。移居的物種只走單程。遷移的物種在兩個不同的地方來回穿梭。牠們有兩個家」(2005: 37)。世世代代遷移於兩地、以兩地為家的帝王蝶成為敬娥這樣跨國流動的女性最佳之暗喻。銘刻於基因中的記憶促使這個蝶種在兩個定點不斷移動，以身體的行動實踐血緣的召喚。

蝴蝶的暗喻在敬娥跟生母與安美購買韓服時再度出現。在諸多色彩繽紛的布料包圍中，安美說出蝴蝶的韓文 (nabi)。姊姊用洋涇濱的英語表達韓服有如蝴蝶的意思，敬娥的想像力起飛：「突然間，我們似乎被滿架的蝶翼所包圍，都在等待輪到牠們飛翔的時刻」

(2005: 132)。年幼時被敬娥用以出風頭的民俗服裝象徵著韓裔的文化認同。成年之後真正能夠欣賞韓服之美的敬娥也學會另一種展現、訴說韓服的方式。等待飛翔的韓服是一個意義加值的禮物，不但帶給敬娥母愛，也讓她體驗到有根的 (rooted) 踏實感。²¹ 遷移的帝王蝶、韓服與蝴蝶在回憶錄的尾聲共同出現，在夢境似的描寫中已逝去的姆媽、敬娥、以及敬娥的女兒都有如蝴蝶一般翩翩飛舞，「姆媽穿著她日出色彩的韓服，我的滿是鳥雀，我的女兒穿著彩虹」，一起加入遷移的蝶群，最後棲息於山間樹林。敬娥的回憶錄在化蝶的想像、在美麗的翅膀開合聲中暫停。²² 就像長期旅行的帝王蝶一樣，「在享受辛苦得來的休息之際低語牠們旅程的秘密，等待著下一刻的來到」(2005: 252)。在呈現流動於血液之中的共同記憶以及現實世界的悲劇磨難之後，《血之語言》透過奇幻式的敘事訴說三代女性的緊密連結與共同等待展現對於生命的希望，敬娥許諾給自己的是一個屬於女性的、繽紛的未來。

那維在研究小說與戲劇中如何表達收養主題的專書中指出，歐美文化的想像有三種收養模式：其一是收養慘劇，以《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 為代表；一是與生身家庭快樂團圓的情節，以莎劇《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 作代表；最後是快樂的收養關係，維多利亞小說《織工馬南》(*Silas Marner*) 即為一例 (2005: 7)。虛構之作經常只能呈現簡化的情節，《血之語言》中的跨國收養敘事證明現實中的收養情節比慘劇或是大團圓的結局更加複雜。鄭敬娥

²¹ 安美與明禧曾經告訴敬娥姆媽在面臨家中幾乎無米之炊的窘境時，仍然堅持替遠在他鄉的女兒以及她們的養母購買禮物 (2005: 116-117)。

²² 在數頁空白之後，《血之語言》又出現被收養的韓國兒童數字統計、關於姓名以及拼音的註解、收養與防治騷擾的網路資源，以及給姆媽的短箋。鄭敬娥回憶錄的續集 (*Fugitive Visions*) 也即將出版，見其個人網頁 [http://www. languageofblood. com/](http://www.languageofblood.com/)。

的回憶錄中對於收養有一段一針見血的評語可以證明這樣的複雜程度——「收養的情境有一種看似如此 (seeming) 與真實如此 (being) 的張力：張力也存在於亮麗的外表下——養父母快活的笑容，從此幸福美滿的期待，如何收養的手冊，絲毫不提生母的可愛繪本——與現實的心境之間」(2005: 226)。《血之語言》也企圖透過各種不同生命經驗與文類的拼貼表達收養行為中基本的矛盾。不管是宗教性的啓發或是個人的決定，以愛之語言為出發的跨國收養最後卻往往以恨收場，尤其是在送養與收養國權力關係不平衡的情況下，跨國／種族的收養行為極難脫離內心與外界失調、期待與現實脫軌的困境。在跨國收養越來越熱門之際，諸如《血之語言》這樣的文本出現恰好提醒我們必須深思此類社會操作所造成的人口流動以及流動之後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筆者在研討會上的經驗只是冰山的一角，只要跨國／種族收養持續存在，「愛之語言」必然不斷面對「血之語言」、甚至「恨之語言」的挑戰。而被收養的悲歌也必然不斷出現，反覆在血緣與血言之間擺盪徘徊。

參考文獻

- Cartwright, L. (2005). Images of “waiting children”: Spectatorship and p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lobal social orphan in the 1990s. In T. A. Volkman (Ed.),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pp. 185-21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Eng, D. (2003). Transnational adoption and queer diasporas. *Social Text*, 21, 3: 1-37.
- Honig, E. A. (2005). Phantom lives, narrative of possibility. In T. A. Volkman (Ed.),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pp. 213-22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übinette, T. (2006). From orphan trains to babylifts: Colonial trafficking, empire building,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J. J. Trenka, J. C. Oparah, & S. Y. Shin (Eds.), *Outsiders within: Writing on transracial adoption* (pp. 139-149). Cambridge, MA: South End.
- Jo, S. (2006). The making of KAD nation. In J. J. Trenka, J. C. Oparah, & S. Y. Shin (Eds.), *Outsiders within: Writing on transracial adoption* (pp. 285-290). Cambridge, MA: South End.
- 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 (2005, May). *Baby exporting nation: The two faces of inter-country adoption*. Retrieved September 3, 2007, from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4439761050204972345&chl=en>
- Kendall, L. (2005). Birth mothers and imaginary lives. In T. A. Volkman (Ed.),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pp. 162-8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im, E. (2005). Wedding citizenship and culture: Korean adoptees and the global family of Korea. In T. A. Volkman (Ed.),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pp. 49-8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im, J. R. (2006). Scattered seeds: The Christian influence on Korean adoption. In J. J. Trenka, J. C. Oparah, & S. Y. Shin (Eds.), *Outsiders within: Writing on transracial adoption* (pp. 151-162). Cambridge, MA: South End.

- Lo, B. K. (2006). Korean psych 101: Concept of hwa-byung (화병/火病) in relation to Korean adoption. In J. J. Trenka, J. C. Oparah, & S. Y. Shin (Eds.), *Outsiders within: Writing on transracial adoption* (pp. 167-176). Cambridge, MA: South End.
- Nelson, K. P. (2006). Shopping for childre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In J. J. Trenka, J. C. Oparah, & S. Y. Shin. (Eds.), *Outsiders within: Writing on transracial adoption* (pp. 89-104). Cambridge, MA: South End.
- Novy, M. (2005). *Reading adoption: Family and difference in fiction and drama*.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Oparah, J. C., Shin, S. Y., & Trenka, J. J. (2006). Introduction. In J. J. Trenka, J. C. Oparah, & S. Y. Shin (Eds.), *Outsiders within: Writing on transracial adoption* (pp. 1-15). Cambridge, MA: South End.
- Roberts, D. (2006). Adoption myths and racial rea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 J. Trenka, J. C. Oparah, & S. Y. Shin. (Eds.), *Outsiders within: Writing on transracial adoption* (pp. 49-56). Cambridge, MA: South End.
- Shadid, B. (2007). "Transnational adoption: ColorNW February story." Retrieved September 2, 2007, from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8809913625563101559>
- Trenka, J. J. (2005). *The language of blood: A memoir*. Saint Paul, MN: Graywolf.
- Volkman, T. A. (2005). New geographies of kinship. In T. A. Volkman (Ed.),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pp. 1-2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Yngvesson, B. (2005). Going "home": Adoption, loss of bearings, and the mythology of roots. In T. A. Volkman (Ed.),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pp. 25-4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Narrativ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The Case of *The Language of Blood***

Pin-chia Fe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30010, Taiwan
E-mail: pcfeng@yahoo.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narrative of transnational/transracial adoption via a case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Blood: A Memoir* by the Korean American author Jane Jeong Trenka.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tries to contextualize Korean adoption narrative with various socio-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first-person narratives so that the possi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the problematic “remapping of kinship” through the act of adoption can be explored. The second part presents a close reading of *The Language of Blood* to investigate the bodily imagin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memoirist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relational network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doption narrative.

Key Words: Jane Jeong Trenka, *The Language of Blood*, transnational/transracial adoptio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life writing